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译丛

丛书主编：周晓虹 王小章

The Future of Society

社会的未来

[英] 威廉·乌思怀特 著 沈 晖 田 蓉 译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方社会建设研究译丛
丛书主编 周晓虹 王小章

社会的未来

[英] 威廉 乌思怀特 著 沈 晖 田 蓉 译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社会的未来/(英) 乌思怀特著; 沈晖译.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308 - 07899 - 3

I. ①社… II. ①乌…②沈… III. ①社会学 - 研究
IV. ①C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57834 号

社会的未来

[英] 威廉·乌思怀特 著 沈晖 田蓉 译

策 划 曾建林

责任编辑 杨苏晓

装帧设计 王小阳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科贸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640mm × 960mm 1/16

印 张 10.25

字 数 151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3 月第 1 版 2011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308 - 07899 - 3

定 价 32.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社会的未来

前 言

这不是一本关于未来学¹的书，尤其不是讨论人类可能结束以社会方式生活的前景——这种前景令人难以置信。确切地说，本书探讨了人类社会关系的本质，以及这些社会关系是否继续或将继续受到以所谓社会为中心的过程和理念的影响。“社会”这个词的使用可以追溯到 17—18 世纪的欧洲；既然有其开始，那么也可能就有其结束。

自 20 世纪 60、70 年代以来，人们越来越感觉到“社会”这个概念趋于过时；而有些人会说它已经过时了。“社会”这个词总是令人质疑。到 20 世纪晚期及 21 世纪初，它已经淹没于人们掀起的批判浪潮中。新自由主义者激烈地否认它的存在：1987 年，撒切尔夫人提出一句名言——“没有社会，只有男人、女人和家庭。”² 后现代主义理论家，特别是鲍德里亚，已经宣称“社会”被融入更加模糊的“群众”观念中³。约翰·厄里（John Urry）等全球化理论家认为，“社会”概念因其根基“民族国家”的衰落而不能幸存⁴。进化心理学和进化社会学已经显示，人类社会模式应该被其他动物物种的不间断社会化模式观念所取代。最后，更多谨慎的评论家回顾了“社会”这样一个社会科学概念的兴衰（彼得·瓦格纳）和被“遗忘”（迈克尔·弗雷塔格）。其他人则已经探讨了如何绕过它（T. 托马斯施温）或者重新进行阐述（弗朗索瓦·杜贝，马尔图切利）。⁵ 社会概念和社会本身 [借用鲍曼（Zygmunt Bauman）近期作品（2002）的书名] 深陷围城。⁶ 然而荒谬的是，我们同时看到“经济体制”（economy）、“社区”、“政治体制”（polity）、“治理”、“民主”等观念被不加批判地再次使用。

本书回顾了其中一些争论，我认为社会的消亡的传闻被极度夸大，正如马克·吐温谈到他已过世的谣传报道时说到的。我认为人类仍然生活在某种能叫做“社会”的东西里；人类在多元层面上参与着连锁的社会群体活动。我们的社会在很多方面都不同于动物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区别是人类能相对明确地表象社会，而这种表象有助于延续社会。⁷单数形式的“社会”被当作是某种特殊联合或社会化（sociation）形式，我认为它不仅仅是一个理念，是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意义上的集体表象，而且这种表象也是社会现实及社会因果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并不总是如此颇为抽象地思考社会，本书第一章就探讨了社会概念的兴起。接着讨论了对社会概念的各种批判，最后思考了如何去建构一个言之有理社会（及公民社会）概念，并将之应用到当代社会现实中去，尤其是运用到正在进行的欧洲一体化进程之中。

- [1] 针对该流派最近一项有趣的实践，其副标题是我无意中借来的，具体参见菲利普·布朗和休·劳德的作品：《资本主义和社会进步：全球经济下的社会前景》。贝辛斯托克：帕尔格雷夫，2001年。
- [2] 见本书第二章。
- [3] 见本书第三章。
- [4] 见本书第四章。
- [5] 见本书第五章。
- [6] 鲍曼，《围困中的社会》（*Society under Siege*）。剑桥：政治组织，2002年。封面的图案相当神秘，描绘了一个巨大洞穴映衬下的科伦水榭的美丽景色。
- [7] 见卡尔霍恩（Craig Calhoun）的例子，布迪厄和詹姆士·科尔曼在《变化中的社会的社会学理论》一书中的“间接关系和其想像的团体：大型社会综合及日常生活的转变”一文，该书于1991年由西景出版社（Westview Press）出版。“想像的共同体”这个术语显然出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经典之作——《想像的共同体：有关民族主义的起源和宣传的深思》，该书于1983年由伦敦 New Left Books 出版。如想了解最近的代表作，请参阅马克·尼奥克里尔斯的著作《想像国家》，该书于2003年由英国开放大学出版社出版。

目 录

第一章 “社会”的起源 / 1

第一部分 对社会的批判 / 19

第二章 社会与个体 / 21

第三章 后现代主义 / 37

第四章 全球化 / 50

第二部分 重建社会 / 61

第五章 现代性与社会 / 63

第六章 面向“合题”？ / 82

第三部分 启迪 / 103

第七章 社会生活？ / 105

第八章 是否存在欧洲社会？ / 114

后记 / 129

参考文献 / 131

索引 / 147

第一章 “社会”的起源

人们是怎么开始使用类似“社会”这样的名词的？他们又是怎么思考我们现在谓之的社会？首先，最重要的，包括中世纪欧洲在内的许多文明都将人类社会看作是宇宙秩序的一部分。例如，中国古代思想受皇权思想框架影响，认为“中原”^①不仅是世界的中心，也是天地和谐的中心，而人类的能动性可能会破坏这种和谐。

根据古希腊思想尤其是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伴随政治共同体与城邦孕育而成的人类联合体/社群 (*koinonia*) 与个体/家庭之间，构成了最基本的对立。前者自然优于后者，正如总体优于部分一样。关于这个概念，我们要注意以下两点：第一，这里没有像我们现在那样倾向的，对社会性和政治性加以区别，例如，当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性动物” (*zoon politikon*) 时，这个术语很容易被翻译成“社会的” (*the social*)；第二，关于总体优于局部这一假定，尽管后来的一些社会政治理论家也认同这一观点，但另外一些理论家则完全否定此假定。在有关社会的讨论中，这种争议贯穿始终，延续至今。凡是强调个体受制于社会，强调社会或集体解释优先原则的，都1 可能被指责为漠视个体的潜在独裁者和极权者，比如自由派对“集体主义”的批判。

亚里士多德当然没有遭受过此类批判。基督教义——犹太思想和希腊思想融合的奇怪产物——引入了公民社会和宗教/神权社会并存的二元结构，但两者却相处融洽。在中世纪欧洲基督教义中，我们也能发现和上述古代中国思想相似的观念。

① 又译为“中土王国”。——译者注

文艺复兴运动^①时期，更确切的说，在17—18世纪“漫长的”启蒙运动中形成了一个更加世俗抽象的社会和国家思想。³“State”、“état”或“stato”^②这些词也不再仅仅指一种事态（这在德语中仍是显著特征），只在“Staat”和“Zustand”的辨析中被统一，即指事件的条件或状态。同样，“社会”也从如“朋友团体这种结社的模糊界定发展为更结构化的概念：公民社会。它存在于一些与新兴国家有关的多元概念化关系之中。如贝克尔（Keith Michael Baker）总结当时法国的情况所说：

字典中可以清楚看到，“société”的词义在17世纪末发生了重要变化。

“société”这个词早期的志愿结社意义并没有消失（与此相关的伙伴关系运动），但是这个词被融入关于社会的更宽泛的意涵，即人类集体生存的基本形式。这种集体生存方式曾经天生属于人类，由人类创造。这是人类需求的必然产物和人类对此需求作出的回应。⁴

从这个意义上理解的社会和政治事物（the political）应该视为自然建构还是人为建构的呢？社会契约论的历史思想实验首先部分地回答了这个问题。D. 佛里斯比（David Frisby）和D. 萨厄（Derek Sayer）²在他们关于社会概念的著作中提到⁵，这个争议在17世纪中叶的霍布斯和18世纪中叶的卢梭（他曾经写过一篇关于自然状态或许从未存在的著名作品）⁶以及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中都有涉及。然而，到这一阶段末期，孟德斯鸠相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赢了这场辩论，尽管可能还需要“提醒”人们一点：人类生活在社会中，需要受到法律的制约，履行各自的义务⁷。

当然孟德斯鸠写的是法国的情况⁸。在德国，“社会”这个词仍然与资产阶级的兴起相关，而且从19世纪到20世纪它都是保守主义者的怀疑对象。布伦奇利（Bluntschli）在其字典中将“社会”解释为“第三等级^③的概念”⁹。1859年，保守主义历史学家海因里希·

① 文艺复兴开始于14世纪。——译者注

② “State”为英语，“état”为法语，“stato”为意大利语。——译者注

③ 1789年的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阶级结构将资本家和工人、农民、小商人一起归于第三等级（the Third Estate）。——译者注

冯·特莱布克 (Heinrich von Treitschke) 就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一观点发表了一篇评论。¹⁰ 在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初期, 政治科学领域抨击政治社会学的“新”概念, 再次出现支持“国家科学” (Staatswissenschaft) 而反对社会科学和社会学的有趣现象。

与德国经验相反, 孟德斯鸠的社会观念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受到了斯图尔特 (Dugald Stewart) 等人的热烈欢迎, 而且他们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 19 世纪中后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分析。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都更趋向于讨论“社会关系”, 而不是“社会”, 在他们看来后者是一个过于不准确的概念。正如马克思在他 1857 年的一段重要的方法论文章中写道: “认为社会是一个单独的主体 (subjekt) 是……要以挑剔而又思辨的眼光看待它。” 他进而在关于“政治经济学方法”的讨论中这样解释:

17 世纪的经济学家们总是从研究总体 (人口、民族、国家和几个国家等) 出发, 却又往往以分析发现少数几个有决定性的抽象关系 (如劳动力分工, 金钱, 价值等) 而结束。一旦这些个别关系被抽象化并确立时, 经济体系就形成了。从劳动力、分
工、需求和交换价值这些简单关系开始, 一直上升到国家和全球市场交换这一层面。后者显然是一种正确的科学方法。具体的就是实在的, 因为这是很多决定的集中, 所以也是多样性的统一。¹³

但马克思也更加强调了社会作为更具体调查的参照系的重要性。在同一文稿里, 他继续写道:

在经济范畴的演替过程中, 和其他任何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一样, 一定不能忘记主体 (在这是指当代资本主义社会) 总是给定的——无论是思维还是在现实中, 因而这些范畴表示本体形态 (the form of being) 与存在特点 (the characteristics of existence), 并经常只是这个具体社会——这一主体的单个方面。¹⁴

19 世纪, 更多关于社会的实证观念得到了发展, 这至少表现在

4 以下三个方面：首先，更加反映种族或“民意”（volkisch）的关于民族性的观念逐渐取代了法国大革命时期思想家的普适的和市民的观念，这些思想家视“民族”更多为一阶级的而非地域性或种族性语汇¹⁵。其次，支持社群的保守主义者既反对资本主义，也反对突然涌现的有关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批判。一方面是社会科学与社会学（孔德于19世纪30年代第一次使用“社会学”一词）之间的复杂联系，“另一方面是社会问题”或者社会主义运动，这些成为了理论争辩的政治背景，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主义者抨击英国的社会科学。从更根本的层次上来看，正如瓦格纳（Peter Wagner）所说的，有关社会及社会科学的讨论，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政治理论的演练，是个人（或私领域）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新界定（见第五章）。

最后，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以及很多中欧作家（如阿尔伯特·史蒂佛尔、奥特马尔·斯潘以及路德维格·贡普洛维奇等）的作品中都出现了生物类比^①的概念。斯宾塞认为“社会就是生物有机体”，他进而将神经系统与电报线等通信新网络进行类比。这些概念演变（采用另外一种生物类比方法）成为20世纪中期的结构功能理论。

作为一种学术专业领域，社会学主要是在19世纪末前后的几十年里发展起来的。在那个时代的众多顶级社会学思想家中，有五位思想家的主要概念性观点对现今学术讨论仍然有重要影响。首先我们应该了解一下迪尔凯姆（Emile Durkheim，又译作“涂尔干”，1858—1917），他是那一代思想家中社会学特点最鲜明且最注重社会的一个。如果说托克维尔（Tocqueville）和孔德（Comte）是法国社会学的鼻祖，那么迪尔凯姆就是法国社会学的奠基人，他撰写了一部堪称社会学章程的著作《社会学方法的准则》¹⁹。接着他开拓性地研究了自杀现象，通过统计分析自杀率的规则变化及规律，他认为社会整合不足或过度均会导致高自杀率。然而，自杀和其他越轨行为一样，在一定范围内而言，是像生物有机体一样运作的社会或社会物种的正常现象。

① 将社会与有机体进行类比。——译者注

迪尔凯姆早些时候在区别正常和非正常社会分工形式的时候也用了类似术语。1885年他在对贡普洛维奇的早期评论中写道,“毫无疑问,社会是一种客观存在,是一个人”。如果说后来他更注意措辞的谨慎和准确性,他还是相信自己最初的直觉知识(intuition)。²²自杀、犯罪、分工和劳资纠纷等现象都是特定社会状态的产物。甚至宗教既不是个简单的幻想(因为比幻想要实在),也不是反映超自然实体(假设他们并不存在),而是社会的反映——宗教是社会概念化、仪式化(celebrate)并巩固团结的一种形式。对迪尔凯姆来说,社会并不是一个确切的有机体,它非常像一个具有不可还原至其组成部分的演生属性以整合形式存在,规定了其常态与病态的操作参数的有机体。

所有这些主张都与迪尔凯姆对其谓之集体表象的重要性的坚持相符合²³。在他早期关于分工的作品中,他曾提到的与简单社会(无发达社会分工)“机械团结”有关的“集体意识”²⁴。在他之后的作品中,集体意识逐渐演变成更多概念,名称各异,如公社意识(conscience commune)、社会意识(conscience sociale)及集体表象(representations collectives)等。迪尔凯姆在思考这些概念所具有的本体论和因果律地位时,很多地方都含糊不清。我们时常能在其引用马克思唯物主义思想时明显看到它比结构或形态的社会关系略逊一筹。²⁵而在他的其他著述中,这些概念的地位又似乎显得举足轻重。他在《自杀论》中主张,“社会生活完全是由表象组成的”²⁶,并在《社会学方法的规则》第2版的序言中声称:“尽管我们清楚表示并反复强调社会生活完全由表象组成,但仍被指责抹杀了社会学的精神要素。”²⁷

斯特曼·琼斯(Sue Stedman Jones)指出,“显然,如果声称社会生活完全由集体表象组成,那么社会体系就是概念化而无层次的”。无论这是不是迪尔凯姆的真正意图,毋庸置疑,表象概念在他的思想中,特别是在将社会概念化过程中是非常重要的。在一次德育讲座上他曾说道,“社会并不是包括其中的个体在历史某阶段的产物”。

但在迪尔凯姆的观念中,无论社会的构成是什么都被其视为一个独立变量、一种物质甚至是导致各种社会进程整体变化的有效诱因。当时很多人排斥的正是这一点,他的读者们也因此感到困扰。英

6 国社会人类学家埃文斯·普里查德 (E. E. Evans-Pritchard) 在对迪尔凯姆宗教理论的批评中写道, “把社会变成上帝 (make society into god) 的是迪尔凯姆而不是原始人”。

和迪尔凯姆相比, 另一个极端是尼采 (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 他从未称自己也很少被人称为社会学家。本书提到他是因为他的文化批判思想和个人英雄主义对政治观念极为不同的各个社会理论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另外三位当之无愧为社会学家的思想家分别是滕尼斯 (Ferdinand Tönnies, 1855—1936)、齐美尔 (Georg Simmel, 1858—1918) 以及马克斯·韦伯 (Max Weber, 1864—1920)。他们的思想都深受尼采的影响。滕尼斯和齐美尔都出版了关于尼采和尼采崇拜 (Nietzsche Cult) 的重要著作。³⁰ 韦伯则作出评论, 肯定马克思和尼采对其及同代社会学家的重要影响。尽管尼采反对社会学和女权主义, 他的著作却对这两个领域都影响深远。³¹

齐美尔的社会观念与迪尔凯姆恰恰相反。他反对任何视社会为一实体的概念, 而是更注重社会互动形式以及社会化 (Vergesellschaftung) 更抽象的社会 (详见第六章)。在其类似康德风格的著述中, 齐美尔从社会成员如何整合他们的活动的角度, 回答了其康德式问题——“社会何以可能?” “与他人组成统一体的意识使这个统一体得以形成。”

齐美尔版本的尼采文化批判采取了其谓之“文化悲剧”的形式——文化革新趋于常规化并且逐步失去其创造性特征。韦伯赋予了文化更加宽泛的概念, 主要是围绕他自己的思想展开的。他从根本上反驳社会的概念, 几乎完全回避虽使用“社会”这个术语, 却更倾向于“社会”的动词形式, 如社会化 (Vergesellschaftung) 和社群形成 (Vergesellschaftung)。他在给罗伯特·利夫曼 (Robert Liefmann) 的信中写道: “如果我成为了一名社会学家……那也是为了终结集合概念的使用。”对韦伯而言, 国家的社会学概念 (而非法律概念) 只能说明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 即有一定数量的个体自觉行动起来, 通过守法、缴税和参军等方式来实现这一理念。韦伯的社会学是关于行动的而非社会的社会学——至少在理论上是与迪尔凯姆的社会学截然相反的。如果他们生活在我们这个时代, 一定会因为各自观点不一而争论不休。然而一个世纪之前, 他们几乎未曾注意到

对方的存在。³⁵

韦伯赞同黑格尔、马克思以及他们的支持者的观点，反对整体社会概念、“概念的实在主义”（begriffsrealismus）和所谓的“具体化”（reification），这成为他自身方法论反思的主要起点（19世纪历史经济学家罗雪尔和克尼斯的早期评论中有记载）。³⁶韦伯并没有直接批评与其同时代的迪尔凯姆基于社会的社会学思想，尽管他对这种社会学很难认同。韦伯的路径深受其朋友齐美尔的影响，他在自己的作品中也多处表达了对齐美尔早期作品诸如《社会差异》（1890）、《历史哲学问题》（1892）、《道德哲学》（1892—1893）及《社会学》（1908）的认可。³⁷本书在第六章将就齐美尔更多的积极反思加以讨论。

的确，只有人类个体、他们的生存环境和所进行的活动才明显是客观存在的，因此，我们的任务只能是去理解他们。然而，社会的本质究竟何在，那种纯从理想化的有机整合的理解，从未被掌握到的社会不应该成为以研究现实为导向的反思的目标。³⁸

韦伯对这种路径取向表示完全赞同，他坚持认为，关于国家或者社区的别于法学的社会学意义上的概念只能在这一条件下形成，那就是个体要有可能主导他们的与社会相关的行为：“是什么动机决定并引导个体成员和参与者加入到共同体中？又是什么因素决定了共同体以此方式运行以至它产生并持续存在？”³⁹

在比较社群形成和社会形成的不同时，韦伯重新研究了滕尼斯对“共同体”（Gemeinschaft）和“社会”（Gesellschaft，有时也译成“association”）作出的经典区分。在《共同体与社会》（1887）中，滕尼斯对比了社区（特别是农村社区）的小规模、亲密和面对面的关系与现代城市大规模、淡漠、官僚化和金钱化的关系。在这里“社会”概念代表了一种特殊形式的社会互动。滕尼斯基本上对这两种形态并无明确的评价。他名义上以中性的或价值中立的方式运用这两个概念为极化的理想类型，但其语言不断地暗示了对现代社会的某种批判。这种批判常见于政治右派的观点，滕尼斯自身所附属的政治左派某种程度上也持此观点。⁴⁰

我之所以花时间来谈论社会的古典社会学及相关社会学观念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其一，这些概念对它们自身有很大影响；其二，它们为后来 20、21 世纪思想家提供了主要的几大概念选择。社会整体观随着结构功能主义及系统理论的出现得到进一步发展，美国的帕森斯和默顿及其后德国的卢曼都是此理论的代表人物。而个体主义取向则为埃尔斯特和马丁·霍利斯的理性选择理论推动，更趋于群体中心的取向在阿兰·杜罕的运动理论及其关于社会运动的社会学思想得到发展。齐美尔继续影响着现象学理论和社会建构理论，这两种理论都强调社会的组成是借助并存在于我们对社会的表达中。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社会被这些理论以不同方式概念化了。

首先我们要把这些较学术性的社会理论置于欧洲政治和思想这一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研究。从上文那段马克思思想的引文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一个理论家兼革命活动者，马克思很重视发掘分析社会内部划分，当然，主要是阶级划分。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8 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第一章的开始有这样一句名言：
9 “至今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

正如马克思所说，他并未发现对其分析资本主义以及略带尝试地分析整个人类历史非常重要的阶级划分模式。这种模式在古希腊及文艺复兴的思想中出现，并逐渐为 19 世纪法国历史学家用于解释社会变迁。正如我们在前几页看到的，对“社会”的分析可以像迪尔凯姆那样是整体主义的，也可以像韦伯那样是个体主义的。他们在社会表象方法上也不相同，包括一元论和二元论或者多元论。《共产党宣言》本质上是二元的，他在身后出版的《资本论》第三卷中再次提到：

在特定的经济形式下，直接的生产者们被榨取了无偿劳动，这种经济形式决定了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因为它迅速从生产本身成长起来并作为一个决定性的因素反作用于生产……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这种关系自然总是以一种明确的方式来回应，这主要表现在劳动的方法及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

在其他作品中，马克思进一步详细分析了这些“经验环境”。虽然他注意到仍存在少数独立自耕农（independent peasantry）和注定要沦为无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他的资本主义基本模型仍然是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极对立。非此即彼的二元论结构。其他的社会划分或差异（种族、宗教和民族等）只是转移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导致的根本矛盾。据此得出的实践结论是将工人的国际运动组织起来：“全世界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然而，在有关法国历史的作品中，马克思以一个可谓多元论的模式将阶级和政治联盟之间划分了更多层级。

韦伯也非常注重分析阶级划分，尽管他只把阶级划分当作是现代社会的分工的一个基础。同时，他也是一个民族主义者（nationalist），他关于解决现代德国阶级冲突的方法是在回答完全非马克思主义问题中形成的，这个问题是——什么阶级最适合领导国家？（他的答案正是资产阶级）与之截然相反，迪尔凯姆则主要关注社会整体，他的政治理论更接近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福利连带主义（welfarist solidarism）。¹⁰

雅克·唐斯勒（Jacques Donzelot）⁴⁴曾指出，法国社会政策发展的实质是试图消除“大众阶层”（popular class）的政治挑战。在德国，俾斯麦在19世纪80年代扩大了福利规定，却在1870—1890年间取缔了新成立的社会党。在英国，“社会问题”以类似的但是某种程度上更加慈善的导向而缺少政治性的术语表达（“请拒绝阶级冲突；我们是英国人”）。英法两国这种侧重点的差异持续至今，依然反映于两国政府就社会排斥问题的应对。在布莱尔政府于1997年当选的时候，英国只提出“排斥”的口号（此概念已在学术界使用了一段时间），排斥基本被视为是一个福利问题。而在法国，排斥则被认为是影响到和谐的共和国公民健康幸福的潜在威胁。

政党政治方面，19世纪的最后30年见证了社会民主的兴起——德国社会民主党（SPD）于1869年成立，英国劳工党于1900年成立。到1906年，德国社会学家沃纳·宋巴特（Werner Sombart）提出了一个有关美国例外论的标准问题，即“为什么美国没有社会主义？”5年后，罗伯特·麦克尔斯（Robert Michels）记录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官僚化问题并为之惋惜。后来宋巴特与麦克尔斯两人分别

10 在德国和意大利从极左派转到了极右派。

从民主制向社会民主制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大半个 20 世纪欧洲的内外政治；正是在 20 世纪末，人们发现很多思想家都显然回到了激进民主的后社会主义话语中。1945 年以后的西欧，社会民
11 主主义和基督教民主主义（以及法国的戴高乐主义）在战后繁荣经济支持下的温和福利政策中达成了统一。

20 世纪的政治极端思想（political extreme）是什么呢？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在思考国家和社会方式方面是不同的。法西斯主义者和纳粹分子明确使用了全能主义国家，纳粹主义用新保守主义和反社会主义的“民族共同体”（Volksgemeinschaft）概念加以粉饰。相比之下，共产主义认为国家最终将会消亡（absterben）而代之以社会的自组织。当然，在实际过程中，国家比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条件下的国家更全能。工会及其他“群众组织”纯粹变成了党化国家的传动机制的传输带。自主结社意义上的公民社会在官方体制的夹缝中或是秘密地存在。20 世纪 80 年代的社会运动是公民社会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运动正是对公民社会概念的回应，这一回应时至今日仍然存在（见第七章）。

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悖论结束对于 1920 年（这年韦伯逝世）前后学术界社会理论的讨论，那就是，与韦伯同时代的“社会学创立之父”中，只有迪尔凯姆维护着社会这个重要的概念。而其他人则以不同方式推崇更温和的“社会化”（sociation）理念，其中有人认为“社会”是互动与社会建构过程的产物（由韦伯和齐美尔提出），有的认为是某种现代化的结社方式（association）（由滕尼斯提出）。在随后的几十年内，更着重整体与实证的关于社会模式的结构—功能主义形式再次出现。

社会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和拉德克利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 1881—1955）研究的是极度缺乏文字记录的界定相对清楚的社会。迪尔凯姆一直很仔细地地区分劳动分工等社会过程的历史解释和因果解释，并就分工对于整体社会的有利影响作功能论的解释。在民族学的田野工作中，前者的区分根本不可能，因此其自然依赖后者功
12 能论的分析。正如布朗曾说：“人们认为，一项制度既具有一般性社

会根源 (raison d'être) 也具有其特殊的历史起源 (raison d'être)。其社会根源有待社会学家或社会人类学家来发现。”

因此，人们通过分析社会制度对于社会及其个体成员需要满足的贡献解释其存在。用功能论术语界定制度似乎没有争议，例如，家庭承担了人口繁衍以及青年人社会化的功能，法律系统规范社会关系，诸如此类；解释某项事物是什么通常就是要分析它有什么功用。后来当帕森斯和默顿等人将这种分析路径吸收到社会学中，我们有时发现这种路径不是什么关于社会生活的特殊理论或进行社会生活研究的方法，而只是一种社会学方法。

然而，批判却给这些和谐而统一的社会概念泼了冷水，该“社会”凭直觉知道所谓的需求并能通过无形的方式保证这些需求被满足。如果返回斯宾塞有机类比的路行不通，我们可以选择其他较抽象的现代系统观念，但是社会组成的“系统整合”（各要素之间的适合程度）与通过共享价值和政治法律规范（对功能论定理也很重要）实现的“社会整合”之间的关系并不明确。对于社会健康、福利以及医生所熟悉的生老病死，真的存在合理标准吗？社会没有冲突的达成共识吗？功能主义系统理论对于社会生活而言不是一种相当保守的方法吗？

对这些异议当然有一些可能的回应，但正如书本上的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很多自然科学理论）并不屈从于教科书所列的方法论的检验和驳斥，而是更多地屈从于与相关科学共同体内外变化松散相连的思潮转变。随着 20 世纪 50 年代“西方”的相对社会和谐（尽管也存在核战威胁并爆发了几次常规战争）被国内冲突（20 13 世纪 60 年代学生掀起了文化运动浪潮）所取代，结构功能主义和系统理论似乎过时了，尤其是在当初势头最强劲的英语国家。（在欧洲大陆尤其是德国更为认真持续的适用着系统理论）

还有其他思考社会的方法吗？最醒目的方式存在于那些完全否认其必要性的路径中。像天文学家和生物学家不把“天空”或者“生活”等这些常识当作参照点一样，实证社会研究者在研究具体社会过程的时候也可以不参照社会概念。⁹即将在第二章详细讨论的理性行动理论家们认为，大规模的社会过程可以从个体动机角度进行解释。而互动理论者们则更关注小规模社会过程，社会语境只是自我